

从“儒马会通”到“儒家马克思主义”

——评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

冯 波*

摘 要：“儒马会通”要解决的是新中国前后两大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一贯关系问题，它也是何中华教授《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既能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能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该著指出了“会通”的两个层次：一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殊文化相结合；二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融合为一。这就要求超越“中西体用”关系，强调互为主体的“相化”过程，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儒家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种融合本民族特色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能够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范式。但“儒家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更加关注唯一经历现代化、并尝试解决西方现代性问题的现代新儒家思想。儒学第三期发展不应该仅仅是国际化、全球化这种量上的扩展，更应该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的质的提升。

关键词：儒马会通；儒家马克思主义；儒学第三期；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

让马克思与孔夫子跨越时空地来一场相遇，或者在马克思主义与儒

* 冯波，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与中西传统，《资本论》与社会批判理论。

学之间相互会通、比较，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是中国一项极具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难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如此。前有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的精彩文章，后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一个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主导意识形态，一个是两千多年来传统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那么这两个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这也正是何中华教授《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 “儒马会通” 的重要性

梁漱溟在1967年起笔撰写《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就是在极力主张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这是延续中国道统之“一以贯之”的必然要求，正如研究者所言，“《理性之国》则是论证新中国的道统，将之同老中国之道统积极联系起来的作品”。^① 即便是对“儒马会通”问题持有否定态度的徐复观，也不得不承认该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从一个人的思想能直接给予政治的影响说，古今中外，也只能提出孔子与马克思可以相提并论。”^② 对世界而言，一个哲人的思想能够直接影响政治的，唯有孔子与马克思可以做到。对中国而言，一个哲人的思想能够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最深刻的、最全面影响的，恐怕也就只有孔子与马克思了。

贺麟说：“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③ 一个新的主导

① 丁耘：《儒家与启蒙：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第164页。

② 徐复观：《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九州出版社，2014，第234页。

③ 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1页。

性意识形态如果与旧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没有任何连续性，那么它就是毫无根基或没有“里子”支撑的东西，很难稳固而长远。反过来说，既然一个新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那么它必然有旧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根基或支撑，而不管人们是否真的意识到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强调现实，但中国的现实与儒学是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姚新中所言，“不考虑儒学，对中国和东亚的认识就是片面的、肤浅的”。^① 因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惯性，一个人只要还是中国人，哪怕口头上极力反对儒学，但在生活中却还无意识地在贯彻着儒家思想。就像何中华教授所说，“儒学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生命和血脉之中，甚至成就中国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自我”。^②

例如，儒家讲“尊尊”，我们现在还是把“尊敬师长”作为美德，即便现在开始强调人格平等，但是现代中国人也很难像西方人那样对自己的老师、长辈直呼其名。再比如，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物象化问题，即现代社会的“去人格”化、“对事不对人”化，但物象化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当代中国现实是相关的呢？当代中国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在“对事不对人”化，我们将之称为“现代化”；但也有不少“对事不对人”化的制度只是对“外”（即小圈子之外）、对“卑”（即社会地位低于制度执行者）的时候才会起作用。

可以说，“亲亲尊尊”的儒家思想之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既阻碍又促进的、尴尬的思想资源。说它是对现代化的一种“阻碍”，因为“亲亲尊尊”意味着讲人情、讲情理，注重人格关系的建立；这是与“对事不对人”化相对立的。说它是对现代化的一种“促进”，因为讲“情理”的儒学恰恰构成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片面强调“物理”的一种矫正。因为物象化意味着以物与物的关系（如商品与货币的关系）抽掉了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要建立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因而人必须服从于非人格的、物的规律，如价值规律、金融

① [英]姚新中：《儒学导论》，刘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第231、232页。

②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32页。

财政规律或股市规律等，从而使人沦为社会总过程的旁观者。

牟宗三说，“理性自始即客观地向外延方面施展，而其客观的落实处即在那些形式概念之建立，故形式概念所成的纲维网一旦造成，理性即归寂而无着处”。^①抽掉“情理”的、“去人格”化的社会关系只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空架子”，故而消除或否定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比如，货币清除了人本身固有的价值，并将人的价值转化为货币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决定的”。^②而强调“亲亲尊尊”的儒学，其现代使命就是使“对事不对人”化的社会关系得到情理的“浸润”，重建人格关系，使被抽掉或遗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物的外壳”中重新显现出来。

现当代新儒家要做的事情何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正是个人以共同体的方式掌握社会生产力，而不是让生产力成为控制人的、非人格的力量，“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③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要求的也是在物的关系基础上重建人格关系，这一点与现当代新儒家的理论要求无异。

可见，一方面是作为新旧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必须相互融通，否则新的主导意识形态很难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儒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化应该是人格关系浸润在物的结构之中的，因此“儒马会通”定然带来的是迥然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定然形成现代文明的一种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应该正是《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一书，乃至当代中国学界通过不同途径主张和研究“儒马会

①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第1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0~571页。

通”的重要背景和理由。

二 如何“儒马会通”？

但“儒马会通”的关键问题或最大难题恰恰是：什么是“会通”？以及如何“儒马会通”？对前一个问题的解答，决定了后一个问题的答案。该著认为“会通”分为两个层面。

1. “会通”意味着普遍与特殊的相互契合

正如他所言，“不同文化传统及作为其各自产物的思想体系之间的‘会通’，首先意味着‘普遍-特殊’层面上的同构。”^①因此，“儒马会通”的第一个途径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殊文化相结合。

那么，为何要在“普遍-特殊”意义上进行“儒马会通”呢？

首先，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特殊文化也是“中国具体实际”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具体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正如该著所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学的会通，乃是它在中国‘活’起来的不可无视的绝对前提”。^②与中国特殊文化（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儒学）有机融合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样式，而不是一个机械地拼接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之中的外来之物。也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才会具有改变中国现实的实践力量。

其次，“儒马会通”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有传统文化、传统心理支撑的理论体系，如此才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该著讲道：“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的土壤中扎根、发芽、开花并结果，能够内在地‘化’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部分，也无法回避对于马克思与孔夫子之间

①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90页。

②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80页。

的思想交集和融通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① 马克思主义只有内在地化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才会在中国源远流长，才会成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由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才不是单纯的、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而成为与中国特殊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学）水乳交融、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

最后，“儒马会通”在实践上已经是实然，而只是理论阐释已经落后于实践而已。正如该著所说：“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和文化事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儒学这两种学说在实践层面上早已实现了接触与融汇，这本身就意味着二者总是存在着某种类似的理路，存在着某种同构性，这是它们会通之可能的内在根据。”^②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所以可以反向推出一个结论，即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文化的儒学之间本来就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已经走在了儒马理论会通的前面；为了使理论切中现实，我们有必要将儒马之间的理论会通阐明清楚。该著明确说道：“在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会通和融合方面，我们所面临的已不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而仅仅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因为实践和历史事实早已回答了前一个问题，后一个问题则有待于我们从理论上作出诠释、给出理由。”^③ 由于实践已经证明了“儒马会通”的可能性、可行性，因此似乎没有必要纠结于二者“能否会通”的问题，而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理论上阐明其会通的可能与可行。

然而历史事实是，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破四旧运动”，中国的不少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在强调儒马之间的对立，直到现在仍有大量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徐复观、牟宗三、李明辉等海外新儒家也坚决地反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通。阅读他们的著作，我们每每都能感受到他们对1949年以后儒学在大陆沦丧的扼腕叹息。然而，该著认为

①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4页。

②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2页。

③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3页。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是虚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有意识地打造成为启蒙话语的结果，“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而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会通”。^①也就是说，儒马对立是在自觉的意识层面上进行的，但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上则表现为“会通”（特别是在中国人“前反思”的生活实践中，儒学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要做的就是将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上的“会通”，提升到自觉的意识层面上。这也是新时代留给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2. “会通”的另一层次就是“创造性地融合为一”

该著提及“‘会通’还有另一层含义，亦即相互诠释和互相发明的关系。因为‘会通’不仅仅是契合，还包括创造，即新的意义的生成。它在本质上是建构性的”，“这无疑是在更高意义上的‘会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其结果就类似于马克思所谓的‘融合成一个新范畴’，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彼此之间相互扬弃，其结果既是儒学的现代化，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②也就是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一成不变、故步自封的理论体系，它们彼此之间正在相互影响、互相融合，并且逐渐融合为一。“相互融合”成为推动儒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因此，必须以“儒马会通”取代“中西体用”的原有模式。“要真正了解并把握马克思同孔夫子的历史性相遇，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学说之间的会通，只有跳出中西体用的窠臼才是可能的”。^③“体”即“本体”“本然”；“用”即“功用”“显现”。不管是中体西用（张之洞）还是西体中用（李泽厚），实际上都躲不开中西文化之间外在“嫁接”的问题。正如贺麟所说：“因中学西学各自成一整套，各自有其体用，不可生吞活剥，割裂零售。且因体用不可倒置，西学之体搬到中

①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5页。

②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90~91页。

③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29页。

国来决不会变成用，中学之用，亦决不能作西学之体”。^① 体与用本是一个整体，中体开不出西用，西体也开不出中用；而所谓“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只不过是將中西文化外在地、机械地拼接在一起而已。相反，贺麟主张：中国文化的转向不是“西化”而是“化西”，“所谓‘化西’，即是自动地自觉地吸收融化，超越扬弃西洋现在已有的文化。但须知这种‘化西’的工作，是建筑在深刻彻底了解西洋各部门文化的整套的体用之全上面”。^② 也就是说，“化西”就是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彻底消化吸收西方文化之优长，将之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有机部分。

尽管贺麟的“化西”之说相比“中西体用”之说更加强调中西文化的内在关系、有机融合，但仍不能完全脱离“体用”范式。因为“化西”本身就预设了中国文化的本位地位以及西方文化的辅位作用，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始终是外来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要吸收、扬弃它，只是为了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因此贺麟之说仍有割裂中西文化之嫌：既然中西文化是相互割裂的，那么中国文化是否真的能够消化吸收西方文化呢？这恰恰是贺麟不去讨论的前提问题。

“儒马会通”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为一，因此没有以哪一个为本位去“化”另一个的问题；或者说它是一个“互化”的过程：“以儒化马”，使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结构的批判成为儒学理解现代社会，完成自身改造的契机；“以马化儒”，使儒学之“仁”“义”成为实现共产主义“人格关系重建”的理想、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儒马会通”意味着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创造性的融合过程中，合成为同一个理论体系，即儒家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儒学。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任何差异。儒学在漫长的人类史、世界史上有其特殊形态，比如，为了满足自汉武帝至清末的中国帝制之需要而形成了“三纲五常”的儒学形态，为了适应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资本主义

①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商务印书馆，2011，第227页。

②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商务印书馆，2011，第227页。

的发展而形成了“工业东亚”的儒学形态，这些特殊形态的儒学有其特殊的时代烙印、阶级属性。这些特殊形态的儒学本身并不与马克思主义相互融通，更不能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混淆。关键不在于中国或东亚哪种形态的儒学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会通，而在于儒学的基本精神与共同原则在经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会通、比较。

因此，第二层含义的“儒马会通”需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经过一个长期的相互批判性地吸收融合的过程，从而最终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儒学形态的“新儒学”，即“马克思主义儒学”；形成一个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等任何马克思主义形态的“新马克思主义”，即“儒家马克思主义”。“儒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关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儒家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

三 “儒家马克思主义”

与贺麟的“化西”之说相比，“儒马会通”是一种“相化”，而会通或相化的结果必然是“儒家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儒学”。可以说，孔孟、程朱、陆王乃至梁（漱溟）熊（十力）之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犹如黑格尔、席勒、韦伯之于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马基雅维利、维科、克罗齐之于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从本民族文化出发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格义、彼此会通，从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最终必将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之典范，成为其他民族理解、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可资借鉴的理论形态。

因此，尽管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儒马会通”抱有许多偏见：相比于“马克思与西方传统”这种正统研究相比，“儒马会通”显得“剑走偏锋”“大开大合”。但从大尺度的时间视域来看，“儒家马克思主义”的构建相对于“马克思研究在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恰恰

是能够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摆脱学徒状态，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重要路向。当然，“儒家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国外马克思学”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因为对马克思思想原意的精准把握以及对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充分认知，恰恰是建构“儒家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儒马会通”不能建立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把握的基础之上，更不可能“闭门造车”“皓首穷经”，不去吸收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益成果。但同时，中国学界也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思想原意以及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前沿的把握这个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将这种学术认知提升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上。

但“儒马会通”或“儒马相化”必须应对徐复观的问题：“要将孔子与马克思作比较，首先遇到时空的大间隔”。^①孔子与马克思时间上相隔2000多年之久，空间上在亚欧大陆的两端，“时空的大间隔，自然形成两个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思想”。^②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时空上的大间隔所带来的差异，是“儒马会通”或建构“儒家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面对的理论难题。因为从表面上看，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二者的相同或相似反而是需要理论的深入探讨才能挖掘出来的。但熟知不等于真知，表面上的差异掩盖不了本质上的同一。理论研究更是不能浮在表面的差异上，而应该透过表面上的差异，发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内在精神、固有原则的同一性，由此我们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有一个恰切的理论交代。

可喜的是，《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一书以辩证法的方式融合了古今中西之差异，使孔夫子与马克思在不同时空下相遇，使表面上迥异的思想之间真正做到相互融通。^①从时间间隔来看，孔夫子与马克思之间隔着一整个现代化、现代性。但何中华教授说：“儒学的前现代性质，同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取向之间，存在着否定之否定

① 徐复观：《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九州出版社，2013，第233页。

② 徐复观：《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九州出版社，2013，第233页

意义上的某种一致性。”^① 现代性是对传统儒学的反动，马克思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辩证沉淀的意义上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性。^② 从空间间隔上讲，孔夫子与马克思之间隔着东西方文化的民族差异。而何中华教授说：“但问题的辩证性质就在于，东西方文化除了差别之外，还存在着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方面，特别是欧陆哲学与中国思想之间的亲和性，恰恰构成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得以会通的文化基础和条件。”^③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上就存在漫长的“东学西渐”“西学东渐”的文化事实。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东方文化也曾部分地进入西方文化（最典型的莫过于东方的希伯来文明与西方原有的希腊文明共同塑造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也曾部分地融入东方文化（如古印度犍陀罗艺术中希腊风格的佛像雕塑，甚至影响了我国的绘画、雕塑等艺术风格）。东西之间并非各自封闭固守的关系，长久以来一直都存在相互交流、相互融通的过程。在哲学上、在思想上也是如此，正如朱谦之所言，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展与宋儒理学对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④ 既如此，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与宋儒理学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

该著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后启蒙性质、后现代性质，被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现代化诉求遮蔽掉了，“在启蒙现代性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和后启蒙性被严重地忽视了。这既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启蒙意义上被解读，也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虚假对立。总之，它导致了双重的误解：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关系的误判，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误读”。^④ 按照李泽厚的说法，在近代中国中，“救亡”高于“启蒙”；反过来说，启蒙是为了救亡图存，马克思主义也是作为救

①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33页。

②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35页。

③ 参见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7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第226~241页。

④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102~103页。

亡图存的一种“启蒙”而来到中国的。一百多年前还苦于没有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是很难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有的后现代、后启蒙性质的。但也因此，百年中国学人往往将马克思主义与前现代的、前启蒙性质的儒学相互对立起来。

正是因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前现代与后现代的辩证一致，以及长期以来历史上东西文化交融互鉴的过程，所以二者可以在历史地运思、现象学祛蔽、人与自然互化、生成性人性论、辩证法等方面有相通之处，并构成《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一书的主体内容，展现了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各自思想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会通比较，而不是停留在对它们整体上、原则上的一致性的抽象讨论上。但可惜的是，该著并未将这些要素进一步体系化，也就是说没有展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会通的这些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因此“儒家马克思主义”的体系还未真正成型。但将《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一书称为“儒家马克思主义体系之雏形”，却是不为过的。

该著不断借用孔子、孟子、荀子、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章学诚等人的儒学思想资源，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相会通比较。视域广阔、资料丰富。但问题就在于：唯独马克思穷其半生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现代性社会分析在《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一书的“儒马会通”中，却是缺席的。马克思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批判现代社会的异化、物化、抽象统治与虚无主义等现代性问题；但孔孟、程朱、陆王却没有经历过现代性，他们没有生活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代。没有经历过现代化而去批判现代性，（像不少国内学人所做的那样）仅仅出于传统儒学的原始立场，以儒家经典为圭臬，拿着孔孟、程朱、陆王的原话来批判现代性，这又是否“合时”“合理”呢？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苦于现代性，而且更苦于现代化还不够。因此在当代中国不能过分批判物象化或“对事不对人”化。现代化不仅仅是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设备，更重要的是要有“对事不对人”化

的制度设计，保障缺乏人脉资源或社会资本的普通人通过自身努力仍然能够得到自我实现，促进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而不使“基本善”（物质利益与公职岗位）成为某些“小圈子”的私有物（就像在传统中国中那样）。在此，强调“亲亲尊尊”“爱有差等”的传统儒学，在促进“对事不对人”化的现代化上，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我们应该在既促进现代化、又批判现代性的意义上去会通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那么，在此意义上，更需要关注的应该是第三期的儒学，即现当代新儒家，而不是第一期（先秦儒家）、第二期（宋明儒家）。这一点也是《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一书没有意识到的。

“儒马会通”不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讲是重要的，对于当代儒学的发展而言也是必要的。正如林安梧所说，“我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及社会批判理论可照见儒家传统偏向于内省式人道主义其缺失何在，并企求补偏救弊之道”。^① 马克思主义之于儒学的重要性恰恰就在于帮助其理解现代社会的根本结构，才能够实现其“新外王”的理想。因此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不应该（像杜维明那样）仅仅停留在科学精神、民主运动、宗教情操与深层意识上，^② 相比之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社会批判理论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层面、社会结构要更为根本。而且，儒学第三期也不应该仅仅是深入的国际化、全球化这种范围或量的扩张，更重要的是要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实现质的提升：面向现代社会之根本结构而展开理论建构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从而建构起“儒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当然，“儒家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展望，还是经历了几代中国学人的理论实践。现当代新儒家第一代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两位先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在为此孜孜努力，直到方克立、张允熠、何中华等在内的无数当下中国学人，已然历经数代之久。这恐怕也是学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不曾关注的、重要的理论事实。

① 林安梧：《“儒家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可能》，《鹅湖月刊》1996年第2期。

② 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第486-491页。



马克思与孔子

一个历史的相遇

何中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 与 孔子

一个历史的相遇

何中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opment of Chinese Marxism in the new era. It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is a masterpiece of deepening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regularity.

Keywords: New Era; Chinese Marxism; Integration

From “The Medi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arxism” to “the Confucian Marxism”: A Review of Professor He Zhonghua’s *Marx and Confucius: A Historical Meeting Between Them* Feng Bo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consist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dominant ideologies before and after new China is solved by the “the medi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arxism”, which is also the core problem to be solved by Professor He Zhonghua’s book <Marx and Confucius>. The solution of this problem will not only promote Chines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rofessor He Zhonghua pointed out two levels of “mediation”: one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special culture of China; Second, Confucianism and Marxism are creatively integrated into one. This requires to go beyond “Chinese-Western and ti (体)-yong (用)” relationship, and emphasize the process of “mutual integration”, the final result of which is “Confucian Marxism”. It is a kind of Marxism that integ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an also become the future paradigm of world Marxism. But the study of “Confucian Marxism” nee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that is undergoing modernization and trying to solve problems of Western modernity.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third period should not only be the quantitativ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but also the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combined with Marxist social critical theory.

Keywords: The Medi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arxism; The Con-

fucian Marxism; Confucianism in the Third Period; He Zhonghua; *Marx and Confucius*

The Defense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A Comment on *Marx's Historical Determinism: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C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s

Zi Yang

Abstract: Historical determinism i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r Marx, it appeared as economic determinism. Professor Wang Fengming's Work, *Marx's Historical Determinism: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C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s* starts from defending Marx's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productive forces determinism, clarifie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remise of the issue of justice, and points out exploitation as ground of poverty in capitalism by distinguishing capitalist commodity production from simple commodity production, distinguishes theoretically between socialist poverty and capitalist poverty, and points out the future developing of human free individuality based on economic advances. This work analyzes the superstructur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from economics and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model of using materialist dialectics.

Keywords: Historical Determinism; Economic Determinism;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tion Relations; Justice

How Do Individuals Present

—A Review on *The Individual Theory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 Analysis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Liu Yu

Abstract: Due to the abstraction of human language and the generality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s, how individuals can be grasped in language has be-